

“新发展主义”与发展社会学的转向

——评田毅鹏教授新著《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

吕方

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语成谶，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天才地发现了“短促的20世纪”这样一个历史断代。诚如霍氏所言，“短促的20世纪，即将在重重问题中落幕”。20世纪的最后20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至少有两大事件必须做出回应。一件是以苏联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另一件则是发展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实践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两件大事件同时投射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内，前者构成了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素材，后者则为“新发展主义”研究设定了基本的论域。在此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为发展社会学开拓了两个重要的新议题。田毅鹏教授的新著《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正是对发展社会学领域内“新发展主义”思潮兴起及其在东亚历史实践的系统研究。

《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一书，以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其最新动向为核心线索，以东亚社会的发展实践为经验素材，系统回顾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体系，并且对“新发展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开启的理论可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由存在紧密内在关联的五个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在系统回顾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新发展主义”理论的内涵、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及主要“新发展主义”理论家的观点。第二部分则深度解析了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主义的历史实践和“新发展主义”的最新动向。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中，作者深入探索了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危机，并对受发展主义思想引领的旧的东亚社会发展模式展开了系统的批判。有了前三部分的理论和经验铺垫，第四和第五部分中，关于“新发展主义”所开启的理论可能的研究成为全书的重点和亮点。

作为一部以“新发展主义”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著作，该书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发展社会学摆脱发展主义的束缚，实现其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向。

首先，将“空间”维度带回发展研究的核心。发展主义执著于发展富有超时空性质的普遍主义模式，其时空观可以简单概括为：历史是线性演进的，而空间则是

无关轻重的因素。对此，田毅鹏教授的总结切中肯綮，“从空间上看，以往各种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模式所作的研究和概括都具有‘空间同质化’特点，普遍缺乏对不同空间特殊性的分析和关注”。在发展主义的理论体系内，“去空间化”实际上内涵于其所包含的时间观念，正是建立在空间的同质性基础上，其线性的历史演进观点才得以成立。因此，对于发展主义的批判，在其最深层次，就在于将空间这一隐设的维度带回分析的重心。“新发展主义”理论认为，即使从受发展主义理论主导的历史实践自身来看，去空间化的思维方式也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社会自起点开始就是一个时空不断重构的过程，如列菲伏尔、哈维等思想家所见，空间即社会，空间构成了理解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维度。具体而言，现代化的过程，打破了之前城市乡村相对凝固的空间秩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开始烟消云散。空间结构的变动，正是社会基础秩序的不断变化，而为变化了的社会基础寻求新的秩序，就成为“新发展主义”的理论旨归。基于上述两点，“新发展主义”在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理论进行总体清算，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发展道路的努力下，将理论的重心放在空间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基础构造的转换。

第二，基于文化自觉的“新发展主义”。客观而言，“新发展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将，对发展主义展开了激进的批判。此一阶段，虽然以其理论的深刻性“动摇了发展主义理论大厦的根基”，但是关于“怎么办”始终没有答案。“新发展主义”在其新的理论阶段，一改之前对发展主义激进的质疑和否定，而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全面拒斥态度，同时也不主张重返西方文化的怀抱，而是力求在文化宽容、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如费老所言，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对西方现代性摧

毁人类精神家园的反驳，追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找回传统，并赋予其现代意义，使之成为理解与调和物质发展和精神进步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指标。使得发展真正回归人的尺度，回归特定文化的内在尺度。

第三，寻求新公共性的构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发展主义危机的回应，东亚学者开始关注新公共性的理论话题。新公共性直面发展主义对于社会基础构造的破坏，在一个利己主义盛行的年代，希望以第三域的发展和微观的基层社会单元（社区）再造来重构社会基础秩序，以此建立健康的社会部门。新公共性成为东亚社会建设的新动向，并且越来越展现为一个具有丰富延展性的理论话语，其要旨在于克服“现代人类社会的剧变和社会生活体系的脆弱化”，通过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风貌和社会基础构造整体重建，获得人类文明的内在和谐。

总体而言，“新发展主义”在以上三个维度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转向。发展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诞生至今，已历一个甲子有余。然而从狭义的社会概念出发，就会发现，发展社会学一直以来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世界体系的政治学批判所主导。在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被置于主导地位，而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则被假设为可以由经济发展自动推导出来。显然，在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乃至政治都未成为其首要关切。继之而起的依附理论，虽然在“中心—边缘”的理论拓扑中反思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发展话语和权力主宰，但是狭义的社会基础构造仍然不是其理论要旨。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论也并没有特别的建树。而在“新发展主义”呼唤发展研究的社会学时代来临之际，诚如田毅鹏教授所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民族国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非政府组织，人们议论的中心议

题不再是‘发展’，相反，对‘发展’的反思却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基于此现实，“在反思‘发展主义’的基础上，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均衡发展，成为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主题”。东亚社会曾一度在发展主义话语的支配下开展了长期的“压缩式现代化”，并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学界视其为挑战西方现代化范本的“东亚模式”。然而，“在师法西方，引进西方‘器物文明’的同时，其社会基础构造必然经受强劲的冲击，众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潜藏在社会深处，成为社会发展运行的潜在风险”。发展主义所必然遭遇的社会悖论，在东亚社会也得到最充分的呈现。“新发展主义”的一系列努力预示着发展研究的社会学时代真正降临。

拜读田教授的新著，在再次享受愉快的阅读体验、收获真知的同时，更为深切的感受在于田教授以知识关怀社会的学术信仰和不懈努力。中国经历了近代的160年、新中国的6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走向世界，“中国模式”引来了世界范围的热捧。然而，“中国模式”背后的忧虑也是现实的。中国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不能有效回应其社会危机，很难想象“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新发展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被理论界逐渐接受，并为思索中国改革、理解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可能。可以预见，中国的“新发展主义”道路一定是基于文化自觉的、中国气派的新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表明中国开始了新发展道路的探索，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的社会，不仅仅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更重要的是对凝聚中华民族力量、汇集中华智慧的邀请。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